

民间信仰的流变与神灵的多元性

——以金泽镇诸神信仰为例

张石然¹

(北京大学 哲学系与宗教学系, 北京 海淀, 100871)

【摘要】本文从李天纲教授《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一书中对于民间信仰的调研出发，深入探究了金泽镇有关神灵的变迁。在资料整理的过程中，笔者总结了相关民间信仰流变的影响因素，并对民间信仰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做出了一些反思。

【关键词】民间信仰；金泽镇；流变；多元性

Folk Belief's Evolution and the Diversity of Gods:

Take the Belief of the Gods in Jinze Town as an Example

ZHANG Shira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Haidian,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folk belief in Professor Li Tiangang's book, *Jinze: the Origin of Folk Sacrifices in Jiangna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nges of gods in Jinze Town. During the process of material reorganization, the author concludes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folk belief's evolution and reflects on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folk belief.

Keywords: folk belief; Jinze Town; evolution; diversity

一、二王庙信仰流变

据李天纲教授在《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一书中所述，金泽镇的二王庙由“信徒王金宝（女）于2003年私自复建”²。起因是王金宝曾有三年生病，卧床不起，“二爷”托梦告诉她要建庙，否则疾病还将发作。王金宝因此奉旨行事，破财建庙，二爷显灵。如此经历的人还不止一个，据书中描述，“和王金宝有相似经历的人不少，都来求情、护庙、烧香、捐款，他们一大群人一起维持着这座小庙，自己管理，账目清爽。”³二王庙因此有了香火，得到了信徒们的承认，虽是私庙，却也有了公庙的功能。

而在此之前，二王庙几乎销声匿迹了半个世纪。在众多州县的地方志中，由于二王庙的尺寸过小，属土庙，也几乎未被记载。只有在金泽邻镇西岑的方志中，记录了岑庄村的一座二爷庙，1958年拆除。⁴

¹ 作者：张石然，邮箱：zhangsr@pku.edu.cn，联系方式：(+86)18811552883，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² 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24页。

³ 同上书，第125页。

⁴ 《西岑志》，<http://qpsz.shqp.gov.cn/djs/xcz/files/basic-html/page342.html>，2019年11月11日。

二王庙最早祭祀的是四川都江堰的水利家李冰。李冰治水的传说最早记于《史记·河渠书》：“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还，穿二江成都之中……又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天下谓之天府也。”而在之后的《风俗通义》等书中，李冰治水便增加了不少神话的色彩。

虽然李冰是一个可考的历史人物，但李冰之子李二郎这个身份却于史无征。据《中国民间诸神》一书，大约在五代，李二郎之神见诸记载，而至唐朝，二郎神兴于庙祀。⁵但笔者并未考据到相关文献，反而是在一些北宋及以后的文献中发现了二郎神祠的记录。如《成都古今集记》中说：“今县西三十三键尾堰索桥有李冰祠。”《事物纪原》卷七中记：“元丰时，国城之西，民立灌口二郎神祠，云神永康导江县广济王子。王即秦李冰也。《会要》所谓冰次子郎君神也。”也有一说，二郎神应为氏族的牧神或猎神，而非李冰之子，其原型是南北朝时氏王杨盛的第二子杨难当。⁶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宋代时，二郎神信仰极为流行，各地多建二郎神庙。据二郎神封号从五代到宋代的变化可以看出，二郎神已由民间神转化成道教神，级别上升到真君。与此同时，二郎神也出现在杂剧等民间艺术中。但是，在《元明孤本杂剧》中的二郎神形象同样并非李二郎，而是隋朝除蛟患的道士赵昱。⁷

进入明代，宋朝宦官杨戩也进入了二郎神信仰。至此，“二郎神”所指的对象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异，而因受《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小说的影响，二郎神的形象也由三眼天神变为头戴三山帽，手执三尖刀，身随哮天犬。

尽管总体上，二郎神的传说始终没有离开擒拿孽龙和斩蛟治水，二郎神的功能也比较稳定，即全国各地“凡有水灾，必祈祷于二郎神”，而且据说十分灵验。但是，从这里我们还是能隐约看见民间信仰流变的混乱。在最早的记录中，二郎并没有作为被祭祀的对象出现，仅仅只有其父李冰被民众祭祀。到了宋代，据考李冰和其子二郎被封王，关于二王的信仰也流传开来。但是各地的祭祀对象并不统一，二王庙的主神地位也比较混乱，有拜李冰者，有拜李二郎者，或二者兼拜，宋明以来，也有奉赵昱为神明，更甚有尊杨戩为二郎神。

从上二王庙信仰的变迁，我们能看出在不同的时代，不但信众所祭祀的二郎神有所不同，二郎神本身的形象和出身也是各有千秋。可见民间信仰在千年的发展中并非呈现单调的统一的形式，而是以多元的复杂的形态，交织着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展。

二、金泽的诸神信仰

据《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一书，金泽镇的二王庙在明代就建造了，但至清代道光年间还不是主要信仰。民国时期，二王庙成为金泽最热的庙宇之一，后于1970年被拆除。金泽镇二王庙的二王形象具体无考，据镇上老人回忆，旧庙里供奉的还是通佑王、显英王，即李冰、李二郎父子。而二王庙中神明的功能现已不得而知，不过显而易见新建的二王庙主体功能已然不再是祈福水灾。庙主王金宝建庙的依凭，不过是上一辈信徒有关二王庙的记忆。据书上写，王金宝告诉作者，二王的生日是三月四日（农历二月十二日）。而据作者查证《中国民间诸神》，转述明代徐应秋《玉芝堂谈荟》，二郎神生日为六月二十六日。而我于清代道光年间苏州文士顾禄所著的《清嘉录》上查到的二郎神生日为六月二十四

⁵ 吕宗力、栾保群：《中国民间诸神》，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55页。

⁶ 李思纯：《灌口氏神考》，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⁷ 李殿元：《天神地祇：道教诸神传说》，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0至161页。

日。⁸

由此也可推测民间信仰是如何在流变过程中发生混乱的。在金泽这样一个神庙众多的镇上，二王庙信仰作为一个并未受到官方重视的民间信仰，在各种书面记录上都极少现身，只能通过信徒们一代代口述相传。而到了现代，二王庙已经消失多年，重新出现也是起因信徒的受梦托付。这种占用公地，树立小神，私自建庙的做法实际上是违规的，但因信徒与政府的抗衡，以及二王的种种显灵，才使得这座私庙得以保存，并逐步具有公庙的功能。从中我们也能看出，要对于中国民间信仰做全面而彻底的研究是何其困难。当信仰随最后几代信徒落寞的时候，它很可能就绝迹于茫茫的民间了。

但是金泽镇上的大部分信仰还是被记录在册，并不断随着社会的转型而发生变化，我们大致能从这些信仰的流变中一窥当时的社会，如城隍神信仰。城隍神最早是吴越地区的地方神，后在宋代广泛传播，成为全国信仰。但是，不同地区的城隍神都是不同姓名的神祇，有其自己的生前事迹，被不同地方的人祭祀，具有很强的地方性。

城隍神的基本功用是祭祀厉鬼。在明清之前，江南的城隍神基本只是作为城市守护神被民众和官府祭祀，维系着中央信仰和地方信仰的交流。而明清以来，其神力已经扩展到了经济蓬勃发展的江南乡镇，功能也发生了转变。一方面因为宋代以来江南人口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乡村经济结构变迁，江南市镇的经济地位提升，并开始形成与乡村不同的文化地位。这反映到民间信仰中，就是在市镇中出现“城隍庙”，在市镇与周围乡村之间形成了“解钱粮”的传统。针对这一现象，有学者指出：“镇城隍的出现确定市镇作为地区祭祀、信仰中心的位置，相对于乡村的各种土地庙而言，形成了上位庙的关系。上下位庙的关系实际上是市镇相对于乡村中心地位的反应。”⁹进一步，有学者认为，“城隍下乡”隐喻着乡村对城市统治关系的挑战，表现了乡村对城市生活的参与。¹⁰¹¹

而进入近代，由于上海社会的转型，城隍信仰被市民团体接管。一批大商人主导了城隍庙的三巡会，控制了整个城隍庙的香火、娱乐和商业。在这样一种转型中，城隍神信仰体现出其现代性，开始与近代社会一同商业化、娱乐化，并以更加普遍的方式进入平民百姓的生活。发展至现今，上海的城隍庙已经成为了江南城隍信仰的总代表，并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大都市圈信仰。

从本质上讲，城隍信仰的下移发端于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继而因社会结构的改变而发生功能性变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城隍信仰的流变一方面体现出城市信仰向上层和农村的渗透和官方与民间信仰的沟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市民社会的发育与民间信徒向宗教公共空间谋取权力的要求。

所以从上述二王庙信仰和城隍庙信仰的流变，我们能够看出民间信仰变异的复杂性。再看金泽镇刘猛将的神谱转移，就更加印证了这样的结论。刘王庙最初是明代的农业蝗神，而在清末转为航运业的水神。其祭祀从民间被打压的淫祀，转变为被祀典接纳的官方信仰，再转而为在水上漂泊不定的船民和渔民所供奉。日本学者滨岛敦俊认为，这个转移，可能与江南地区多位刘姓神祇的融合有关。

⁸ (清)顾禄：《清嘉录》卷六，《二郎神生日》，第142页。

⁹ 郭伟平：《明清以来江南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与民间文化信仰研究》，载《农业考古》2017年第3期。

¹⁰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81页。

¹¹ 吴滔：《清代苏州地区的村庙和镇庙：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载《复印报刊资料（宗教）》2004年第5期。

而据李天纲教授在金泽的考证与推测,到了清代嘉庆年间以后,金泽刘猛将庙已为士大夫控制,变成了镇乡上的儒教信仰。¹²刘猛将从蝗神向水神的流变可以解释为乞丐的身份认同,但是水神向文神的流变似乎无从考证。很有可能在信仰传播的过程中,神明的出身和故事发生了变异,进而导致刘王神被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群众认可接受,形成了新的神谱。而金泽镇的刘王庙信仰也变成了一个身份融合的复合信仰。

三、民间信仰流变背后

从金泽的二王庙信仰、城隍庙信仰和刘王庙信仰的流变中我们能看到民间信仰流变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这不仅体现在信奉的神灵形象的多元和复杂,同时也在祭祀承担的功能和信众群体的身份上有所反映。

神祇发生迁移的原因多半直接来源于神明故事的变异和融合。我们可以从二王庙信仰和刘王庙信仰的流变中看到,民间信仰的发展并不是连贯而一致的,而是处于一个动态的转移和平衡。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神灵因多个同姓的甚至异姓的神明故事相融合,而分化出多样的形象,拥有了不尽相同的神格。与此同时,民间艺术也会对民间信仰加以艺术化的处理而将其更广泛的传播,从而重塑民众对于神仙形象和出身的印象。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和信仰双向交叉地影响着彼此,造成某种流变上的混乱,使得对于民间信仰起源的研究变得困难而模糊。

但在变迁过程中,根本上不会改变的是,民间信仰必定起源于信众对于神祇的认同。笔者认为,民间信仰产生流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身份的信众产生了对神祇的信仰。从刘猛将信仰的变化中,我们能看到刘王神的身份从最初的驱蝗神,转移到为船民所信奉的水神,再发展到被金泽镇上的缙绅阶层接纳祭祀,这样的变化和神谱转移是值得深思和考究的。李天纲教授在书中提出的观点是,“刘猛将承忠,元代贵族功臣,他的神迹正可以用来加强船民们的身份感,凝聚和强化族群内部的认同意识”¹³。这一观点正符合笔者所认为的信众认同。而至于刘猛将从水神向文神的转变,虽在金泽镇具体已难考,但可以推测在传播的过程中,刘王庙信仰渗入了与士大夫阶层相关的神话传说,满足了缙绅阶层的某种心理需要,进而成为文神,为文人儒士所祭祀。

从结构上来讲,社会经济生产方式、文化等级结构的改变,会对民间信仰造成功能性和结构性的改变。城隍信仰的下移就很好地反映了上层与下层信仰的对话交流和融合转变,同时也体现出不同群体对于信仰的要求和宗教话语空间的索取。倘若能进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视角,对于民间信仰进行再考证和再探源,必定能获得更深刻而丰富的认识。

此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金泽所属的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以来经济文化发展最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一个大都市,非但没有因为现代化而信仰绝迹,反而仍保留着一系列宗教信仰与相关的仪式,甚至长三角洲地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最发达的上海为中心的大都市圈信仰。一般意义上,我们会认为宗教信仰和现代性是不相兼容、此消彼长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会促进人类社会现代化,同时也使得人更加趋于理性化,这样的过程会对传统的宗教生活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我们发现其实在现代城市人心中信仰依旧存在,可能转换了形式,但绝对没有消减。

因此,对于民间信仰,我们应该采取审慎研究的态度,考察它在中国文化数

¹² 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16页。

¹³ 同上书,第114页。

千年中的流变,以及它与现当代社会的对话,而非一味地将其贬斥为“愚昧落后”。我们已经能看到民间信仰在中国乡镇生活中的重要性,倘若研究者能把握住民间信仰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那么中国千年的民间社会生活必然能够被更有效地打开和进入。

【参考文献】

- [1] 李天纲. 金泽: 江南民间祭祀探源[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 [2] 唐力行等. 多元与差异: 苏州与徽州民间信仰比较[J]. 社会科学, 2005, (3).
- [3] 郭伟平. 明清以来江南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与民间文化信仰研究[J]. 农业考古, 2017, (3).
- [4] 吕宗力等. 中国民间诸神[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5] 李殿元. 天神地祇: 道教诸神传说[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2.
- [6] 李思纯. 灌口氏神考[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